

党外人士眼中的毛泽东

沈钧儒眼中的毛泽东

“今后一切，伫待明教”

□ 彭晓辉

沈钧儒的一生，横跨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时期，从一个封建社会的进士，成长为一个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成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参与了抗日救亡、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若干重要工作，与毛泽东颇多交集。沈钧儒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革命导师，“今后一切，伫待明教”，号召大家“努力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心心相印”的亲密战友

1935年5月、6月，日本侵略者连续蓄意制造事端，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秦土协议》，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沈钧儒忧心忡忡，组织爱国人士讨论时局，努力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1936年4月下旬，毛泽东委派相关同志与他联系，传达中共《八一宣言》精神，表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组织形式，号召全国人民携手共同救国。毛泽东的抗日政策，犹如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他抗日救亡的前行之路，促使他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亲密合作。此后沈钧儒一直忠诚履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

毛泽东善于团结合作，主动化解矛盾、消除误会，沈钧儒有切身感受。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热烈回应沈钧儒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对其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立场和主张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给予支持。当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误会时，毛泽东致信给沈钧儒等民主人

士，诚挚地解释事情的原委、由来，并委托潘汉年与沈钧儒等经常交流意见。

在面对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特别是在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一边开展反分裂斗争，一边团结抗日，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沈钧儒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决心与共产党共进退。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救国的大旗，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沈钧儒将毛泽东视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对共产党人说：“我们与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指挥若定，劳苦功高”

在沈钧儒看来，毛泽东为和平建国付出了极大努力。为了尽力争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年逾古稀的沈钧儒听到消息后，“快活得像个青年”，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面对欢迎的人群，身材矮小的他在人群外焦急地不停地喊，“我是沈钧儒，请让一下”，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沈钧儒才得以走到神交已久的毛泽东身边，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亲切交谈。

之后毛泽东到特园出席民盟的宴请，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席间，毛泽东认真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会对和谈抱有诚意，于是善意地向毛泽东作了提醒。毛泽东听了沈钧儒掏心窝的

话，很是感激，明确表示“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在毛泽东及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沈钧儒在调停国共争端的过程中发现，毛泽东及中共说话算话，说到一定会做到，而蒋介石、国民党却背信弃义。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沈钧儒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的丑恶嘴脸，更加信任支持毛泽东，并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沈钧儒决然放弃中间道路，支持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的各项革命主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义事业必胜。

在沈钧儒眼中，毛泽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中共领导。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沈钧儒，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沈钧儒接到来信后，非常高兴，积极响应“五一”号召，满腔热情地参与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随后沈钧儒应邀来到东北解放区，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等政策，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衷心拥护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无比高兴并吟诗抒怀，“光明自有擎天炬，照澈千秋与五洲”。1949年，为了全国彻底解放，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沈钧儒致信赞叹毛泽东“指挥若定，劳苦功高”。

“英明的人民领袖”

在沈钧儒看来，新中国要担负起许多重大任务，有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正确的坚强的领

导”，就有办法克服任何困难。1951年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坚决贯彻落实条例精神，肃清了很多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取得辉煌成就，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群众生气勃勃，斗志昂扬。

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工作十分重视，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1950年8月，沈钧儒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代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访问西北各兄弟民族。沈钧儒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开展一切工作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沈钧儒深受教育和启发。1953年9月16日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防治血吸虫病的信。毛泽东高度重视，很快回信，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消灭了危害和肆虐人民的血吸虫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4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工作。沈钧儒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写入宪法条款，让他倍感欢欣鼓舞。

沈钧儒衷心拥护和爱戴“英明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他曾对家人说：“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这是他爱戴毛泽东的最深厚的思想根基。



何叔衡烈士纪念碑矗立在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何叔衡烈士纪念广场，纪念碑高21.68米，宽4.02米，厚2.22米，由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组成。其中，碑座高1.921米，寓意党的一大召开的年份；碑额高1米，寓意党的一大。碑正面刻有“何叔衡烈士纪念碑”，背面是《何叔衡烈士纪念碑碑文》，全文如下：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宁乡杓子冲。一九一三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四月与毛泽东等创建新民学会。一九二〇年冬，与毛泽东共同创建中共湖南早期组织。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共一大。同年十月参与创建中共湖南支部（省委前身）。一九二八年，赴苏联学习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一九三〇年回国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农检查（察——作者注）人民委员、临时最高法院主席、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长汀水口小迳村遇敌围堵，临危不惧，高呼“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奋身跳崖，壮烈牺牲。

何叔衡烈士魂归故乡，永垂不朽！

中共宁乡县委
宁乡县人民政府
二〇一四年三月建立

碑文概述了何叔衡光辉的一生，深切表达了对烈士的缅怀之情，读来令人肃然生敬。

党的一大最年长的代表

何叔衡于1876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今宁乡市）杓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旧环境成长的何叔衡没有掉入时代的宿命。1902年，何叔衡考中秀才后愤于衙门黑暗腐朽，没有担任县衙委任的管理钱粮的职务，而是回家教书种地。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辞去教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对于为何这么大年纪还当学生，何叔衡的回答是：“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在长沙求学期间，何叔衡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并逐渐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何叔衡参与创建新民学会，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新思想宣传和革命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逐渐成为当地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何叔衡和毛泽东作为长沙的代表参加会议，45岁的何叔衡成为年纪最大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完一大后，何叔衡回到长沙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革命，与毛泽东等一起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介绍了谢觉哉、夏明翰等多人入党。同时与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人才、推动工人运动发展。1927年，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其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革命理论和领导方法。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巫锡文 欧阳春香

苏区的“反腐先锋”

1931年秋，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进入中央苏区，并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即部长），后又任内务部代理部长。苏维埃政府内的工农检察机关，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察和监督的机构。在何叔衡的领导下，苏区建立起由突击队、控告局、轻骑队、工农检察通讯员组成的立体化监督网络。其中，控告局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控告，并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控告机制建立后，很快就有人举报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何叔衡接案后克服重重阻力查清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经临时最高法院审理判决其死刑，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1933年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涉嫌贪污工程款，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袒护包庇左祥云，阻挠案情侦破，还质疑查案会影响工程进度。为此，有人说“何老头子”是别有用心要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左”倾路线执行者也放出风要撤销何叔衡的工农检察部部长职务，何叔衡却坚定地说：人民赋予我们这个权力，我们就要对人民负责。至于我个人，不要说是撤了我的职，就是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在何叔衡的主持下，中央苏区掀起了红色政权的第一次反腐肃贪风暴。

1932年2月，苏区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临时最高法院，委任何叔衡兼任最高法院庭主席，他由此成为红色政权的第一任“大法官”。何叔衡在审理案件中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把关，慎重判决，着力纠正原判量刑过重的案件。对于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何叔衡则执法如山，坚决通过司法途径将之绳之以法。1932年夏，在查办审理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涉黑案时，何叔衡收到装有子弹的信封，他毫不退缩，轻蔑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最终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何青天”的美名便在苏区传开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送别挚友时，他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送给谢觉哉，并表示：从我投身革命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了，我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至福建的长汀突围战斗中，面对敌人的围堵堵截，何叔衡体力难支，为了不拖累同伴，他纵身跳下悬崖，被敌人找到后拼死反抗，不幸壮烈牺牲，时年59岁，践行了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